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冲突

李 存 训

1951年4月11日,正值朝鲜战争酣战之际,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以及远东美国陆军司令,并命令美国驻朝第八军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接替麦克阿瑟原来所担任的职务。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立即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引起一场大风波。右翼共和党人和院外援华集团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展开猛烈的攻击。他们要求全面审查政府的外交、军事政策,邀请麦克阿瑟立即返回华盛顿向国会阐述他的全部观点;甚至研究弹劾总统的可能性。许多市镇烧了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模拟像,好几个州议会通过谴责杜鲁门、支持麦克阿瑟的决议。麦克阿瑟本人也牢骚满腹地说,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那一位司令官“比我这次被解职所使用的手段更为严厉的了”,“没有一个办公室听差,没有一个打杂女工,没有随便哪一种仆人会这样无情地不顾起码的体面而被解雇”^①。

麦克阿瑟事件使共和党反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运动发展到顶点,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一步推向高潮。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插曲如此异乎寻常或如此具有特色”^②。杜鲁门为什么要解除麦克阿瑟的指挥权?究竟他俩在对华政策上有那些分歧和冲突?本文专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欧洲第一还是亚洲第一

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的主要分歧。以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为代表的欧洲第一主义者认为,西欧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先进,拥有最大量的熟练工人、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巨大工业中心,是美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和重要的投资场所。而且,西欧控制着广大富饶的殖民地和美国军事工业亟需的许多重要战略原料,以及对美国安全来说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英吉利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美国控制西欧,就可控制出北海到大西洋、出地中海到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就可保持对整个欧洲海域的控制权,还可利用西欧的经济军事力量,向东南与苏联争夺中东、非洲,进而威逼苏联心脏地带。西欧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战略方面,都是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主要利益所在。美国要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不能不以欧洲作为全球战略重点。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推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为了联合拉拢西欧盟国,遏制苏联扩张的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的。1946—1949年美国没有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干涉中国的内战,也是考虑到战后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严酷的现实使它无法东西兼顾。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艾奇逊坚持认为,克里姆林宫控制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欧和远东的共产党政府不过是“傀儡”,苏联的目标是要统治世界,最大的危险仍在西欧。1950年12月英美首脑在华盛顿会谈时,艾奇逊明确指出:“首先必须记住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朝鲜行动完全出自莫斯科的唆使。……如果我们被纠缠在亚洲,俄国就会在欧洲放手干起来”^③。杜鲁门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也“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④。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1951年1月,他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大声疾呼,“沙皇帝国主义已经被更加野心勃勃的,更狡猾的和更富于威胁性的苏联统治者的帝国主义所取代”。“苏俄征服世界的威胁危害着我们的自由。所有自由国家都遭到威胁,都处于危险之中”。他再三强调,欧洲的防务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防务的基础。如果苏联控制西欧,用不着诉诸战争,用不着进攻美国,只要通过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就可以获得对世界的统治^⑤。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得更为明确:“如果我们失去西欧,

……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然能生存，重振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因而该派人士毫不讳言，美国不能离开西欧，正如阿拉斯加不能离开美国一样。

另一方面，以麦克阿瑟、右翼共和党人为代表的亚洲第一主义者的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亚洲各民族占着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拥有世界自然资源的60%，正在迅速地结成一股道德和物质的新力量，未来世界事务和经济的重心必然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前线已由美洲西海岸转到亚洲东海岸，整个太平洋已成为美国的内湖。这一派人士代表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利益，需要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开拓市场。他们重亚轻欧，主张把美国全球战略重点放在亚洲，至少要欧亚并重。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当时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武装部队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就激烈反对罗斯福总统制定的“应该集中力量首先对付德国”的“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要求大大扩大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这种观点得到共和党内许多孤立主义分子的支持。1944年，麦克阿瑟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批评华盛顿的战略部署，说美国不应介入欧洲的争端。他以基督启示的语调叙述了亚洲的未来：“欧洲是一个垂死的体制，正在日趋衰亡，终将为苏联经济和工业霸权所统治。……濒临太平洋并拥有亿万居民的地区，必将决定今后一万年历史的进程……斯大林也了解太平洋的形势，他一面在欧洲打仗，眼睛却望着亚洲。”^⑥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麦克阿瑟已考虑到战后美苏争夺的全球战略重点不在欧洲，而在亚洲。战后作为驻日占领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认为日本没有中国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市场，就不能重建它的经济和恢复大国地位。因此，他和众议员周以德、参议员塔夫脱等人主张，美国必须支持坚决反共的蒋介石。1949年，当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陆时，他们认为没有给蒋有效的支持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的错误，是对美国安全的严重打击，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继续优先考虑欧洲的缘故”^⑦。1950年8月23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东京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上强调说，亚洲正是共产党阴谋家们为了挖空心思地征服全球而选中的地点。考验的地点不在柏林或维也纳，也不在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现在，它就在这里，南朝鲜的洛东江沿岸。“如果我们在亚洲败于共产主义，则欧洲的命运将岌岌可危。战而胜之，则欧洲就可能免于战争而保住自由。如果这里作出错误或迟钝的决定，我们就会完蛋”^⑧。他甚至说苏联的战略是“声西击东”，“故意造成一种要侵略欧洲的明显的假象，以掩盖其在远东扩张的真实目标”^⑨。他指责华盛顿的上层人物对于远东形势了解得很少，而且错误地降低了它的重要性，给他“留下一种令人忧虑和不安的感觉。”他主张把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移到亚洲，要求杜鲁门政府在亚洲与共产主义决一死战。

二、囚蒋于笼还是放蒋出笼

美国在侵朝战争中要不要使用蒋介石的残余部队，是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窜犯大陆，是“囚蒋于笼”，还是“放蒋出笼”，这是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对华政策上另一个重要分歧。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政府献媚，“他愿意派遣33,000人的地面部队”参加侵朝战争，企图凭借美国的力量卷土重来，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杜鲁门本来倾向于接受蒋介石关于出兵朝鲜的请求。但国务卿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顾问劝阻了他。艾奇逊指出，国民党的情况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有所区别。如果国民党军队在朝鲜出现，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决定参战。他们可以趁此打击蒋介石的军队，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进攻台湾时蒋介石难以自卫。三军参谋长们认为蒋介石军队同李承晚伪军一样，士气低落，训练不良，缺乏现代化装备，不堪共军一击，或者同共军一接触就投降而倒向敌方。此外，蒋介石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还需要美国提供运输力量和后勤，不如用来支持美国自己的军队更为适合。经过权衡利弊之后，杜鲁门接受了顾问们的看法，决定“婉言谢绝”蒋介石提供军队的援助。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将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该舰队将执行一项双重任务：一是阻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一是阻止蒋介石从台湾侵扰大陆^⑩。后者的目的即“囚蒋于笼”，不许蒋乘机出来闹事，以免扩大冲突。这个被称之为使“台湾中立化”和“囚蒋于笼”的新政策，立即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一场很大的争议。国会中那些大肆攻击杜鲁门和艾奇逊“丢掉了中国”的右翼共和党人和麦克阿瑟将军，此刻又跳出来攻击杜鲁门政府“囚蒋于笼”的政策“束缚了”蒋介石的手脚，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说，蒋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军队，在美国提供空中力量和两栖船舰的支持下，蒋就能够“光复大陆”消灭共产党军队，重新夺回中国。为什么不“放蒋出笼”，让他去进攻中国大陆，从而削弱共产党在远东的势力呢？^⑪

1950年7月31日,在事前未告知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情况下,麦克阿瑟竟率领一个由16名高级军官组成的代表团窜到台湾,策划起用蒋军窜犯大陆,以分散在朝美军承受的压力。他一下飞机直奔草山蒋寓密谈。双方商定,蒋介石集团的陆海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蒋军所需军火弹药、物资、武器由美国远东军事总部供应;除第七舰队外,还增派第十三航空队去台湾。8月2日,蒋介石发表声明,说他与麦克阿瑟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他对麦克阿瑟“仰慕已久”,“现得能与老战友麦克阿瑟将军再度密切合作”,深信“反对共产主义侵略之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⑬。

麦克阿瑟台湾之行引起全世界新闻界的各种猜测和西方盟国严重不安,他们害怕被迫拖入一场中美大战。杜鲁门从8月1日的新闻报导中获悉这一消息后大为吃惊。他写道,这一切意味着麦克阿瑟拒绝接受我的使台湾中立化和“囚蒋于笼”的政策,并且倾向于采取更冒险的“放蒋出笼”的政策。8月6日,他指派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向麦克阿瑟解释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政策:“要他(麦克阿瑟)不得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得把我们拖入和大陆中国作战”。麦克阿瑟虽向哈里曼表示:“作为一个军人,他将遵守总统的任何命令”,但“总的印象他并不真的同意”^⑭。麦克阿瑟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愿意和共产主义作战,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1950年11月底,麦克阿瑟又致电华盛顿,紧急建议授权给他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蒋介石军队。华盛顿回电说,这个建议的后果牵涉到全世界,应当极为审慎,以免西方盟国的团结遭到分裂,而使美国陷于孤立^⑮。

三、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是公开侵占台湾

以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与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都极端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强调台湾对于美国在战略上是极为重要的,一致主张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不让共产党占有台湾。但在侵略台湾的策略上则有分歧,麦克阿瑟主张公开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杜鲁门和艾奇逊则企图通过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以掩盖美国的侵略意图。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罗斯福总统庄严签署的开罗宣言的墨汁未干,美国军方就蓄意霸占中国领土台湾。1944年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在谈到太平洋的战略形势时,指着太平洋地图上的台湾岛说:“这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掌握福摩萨(台湾),谁就能控制亚洲大陆整个海岸。我们永远永远不能允许这个岛被任何一个可能在未来与我们为敌的大国所控制。在战后的亚洲,我们必须从这里的基地保持前进态势”^⑯。这段话充分说明,战后美国企图控制中国领土台湾不是偶然的。

1949年1月15日,国务院征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对台湾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的估计之后,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全面的对台政策报告,指出美国的基本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达此目标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开”,而美国则要避免“公开地、单方面地为它负责”^⑰。该年3月,这份报告由总统批准,成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

如何实现大陆与台湾分离这一目标,军方主张采用军事手段不让共产党取得台湾,而艾奇逊则认为:“如果想要我们当前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必须小心掩盖我们想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愿望”。“以免破坏美国在中国正在出现的新地位”^⑱。为此,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先后泡制“台湾地位未定论”和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的方案,企图利用联合国之名,行美国控制之实。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两天,杜鲁门发表声明,正式提出“台湾未定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⑲,胡说什么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保持太平洋的安全”,是由于朝鲜战争所引起的“临时措施”。与艾奇逊的必须“掩盖”美国真实意图的原则一样,杜鲁门也是企图用“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中立化”这类虚伪的言词来掩盖美国侵略台湾的野心,以避免在亚洲丧失人心,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行为。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完全不领会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政策意图。他打算于1950年8月28日在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上宣读的声明,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政策进行了极为傲慢的抨击。这位将军声称:“那些鼓吹在太平洋实行姑息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说,如果我们保卫福摩萨,就会疏远亚洲大陆,再没有比这种陈腐论调更荒谬的了。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不懂得东方”。他认为台湾是美国太平洋前线中的“总枢纽”,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它的潜力比黄海至马六甲海峡之间亚洲大陆上任何类似的地方都更大”。他公开主张,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以便美国“用空军控制自海参威至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的海港”,用潜水艇“威胁整个从南方来的海运并切断西太平洋的所有海上通路”^⑳。麦克阿瑟这篇不打自招的供词,和盘托出了美

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计划,被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抓住了辫子,引起了西欧盟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使美国政府感到被动。杜鲁门对此极为恼火,立即训令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命令麦克阿瑟撤回他的声明,但为时已晚,各大报刊已刊载麦克阿瑟演说稿全文。杜鲁门当时就曾考虑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远东战区指挥官的职务而代之以布雷德利将军,但苦于美军在朝鲜处境不妙,仁川登陆的反攻计划尚在麦克阿瑟总部策划中,不能马上采取这一步骤。于是,杜鲁门于9月11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掉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的职务,作为麦克阿瑟的替罪羊^①。

四、侵朝战争的失败应由谁负责

当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发表武装干涉朝鲜的声明时,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全都站起来欢呼。全国各地拍来的电报似潮水一般涌向白宫。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杜威表示“全心全意赞同和支持总统所作出的决定”。麦克阿瑟热烈赞扬说:“总统的声明是非常伟大的。这是一个把世界从共产党统治下拯救出来的历史性的决定。”^②当麦克阿瑟接到杜鲁门任命他为联合国军司令时,他向杜鲁门发誓:“我个人完全忠于您,……决不使您失望”^③。仁川登陆成功之后,总统和将军都为暂时的胜利而冲昏头脑,他俩一致同意越过三八线,向北采取军事行动,企图用武力强行“统一朝鲜”。10月15日在威克岛会谈,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少,“倘若中共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10月17日,杜鲁门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赞扬仁川登陆“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的一页”,吹捧麦克阿瑟将军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战士”^④。这些事实说明,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侵朝政策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可是,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节节失利,特别是1950年11月24日,侵朝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悍然发动一次事先向士兵宣布的“保证美军回家过圣诞节”的“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快将进犯到中国边境的美国侵略军击退到三八线一带,总计歼敌34,700名,其中美军21,000余人。美《新闻周刊》说,“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军事上最大的失败,它也许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⑤。美国侵略军在战场上所遭到的沉重打击震撼了美国统治集团。他们处境很狼狈,乱作一团。为了追究战争失败的替罪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互相埋怨,互相指责,越吵越凶。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转而怨气冲天,惊慌失措,他在四天之内,用四种不同方式向新闻记者宣布,他之所以倒霉,不能打败中国人民志愿军,仅仅是因为华盛顿强加给他的“禁令”,把作战行动限制在朝鲜境内,使他不能用空军袭击在中国东北的供应线。他指责这种“惊人的限制”是“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一个巨大障碍”。他坚决否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是他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引起的。他反复声明,他的每一个战略和战术行动,“完全符合”联合国决议精神,“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是由华盛顿作出的”^⑥。这样,麦克阿瑟把侵朝战争失败的责任统统推到杜鲁门身上,而将自己的罪责洗刷得一干二净。

杜鲁门对此极为愤怒。他指责麦克阿瑟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麦克阿瑟企图为自己的过失辩护的态度我是不能原谅的”。如果采纳他的意见,“那我们就已经公开和红色中国作战了,甚至和俄国公开作战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已经爆发了”。杜鲁门再次想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他没有这样作的原因是,不愿意使外界以为他撤麦克阿瑟的职,是因为攻势失败而引起的。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发布命令,未经国务院事前许可,禁止任何文武官员发表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说、新闻电讯或其他公开的声明^⑦。这一命令显然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的。令人惊奇的是,麦克阿瑟立即对这一命令进行挑战,发表了一项傲慢的谴责华盛顿的声明。

五、有限战争还是全面战争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在朝鲜中部西海岸仁川港登陆成功之后,杜鲁门曾指望凭借美国的军事优势,采用闪电战术,下令美军越过三八线,一举击溃北朝鲜的武装力量,把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扩大到整个朝鲜。但到1950年冬,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美国军事上的严重失利,其政策又转向把美国的目标限制在恢复战前南朝鲜的边界而进行一场有限战争。这一则是为了避免和中国全面作战而耗尽美国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和资源,榨干美国的“鲜血”,使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务。二则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而招致苏联对西欧的袭击。杜鲁门写道:“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者。一旦我们进攻共产党中国,那末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自然,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规模的战争”^⑧。三则是美国的主要西欧盟国都毫无

例外地反对扩大侵朝战争。英法不愿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本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为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1950年12月,英美首脑在华盛顿会谈时,英国首相艾德礼直言不讳地告诫杜鲁门说,不要轰炸中国,要设法避免和中国进行大战,扩大战争对西方国家来说等于自杀^②。他主张分化中苏关系,利用中国在远东抗衡俄国。这样,如果美国单方面决定把战火烧到中国,就会破坏西方联盟的团结,使自己陷于孤立。基于上述理由,杜鲁门政府不敢冒险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而只愿打一场有限战争,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保持对海空力量的限制,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稳定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寻求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完全不理会有限战争的概念和杜鲁门政府全球战略的意图。他认为,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拥有战略空军和原子武器的优势,可以威胁苏联,使其不敢发动全面战争。他指责“禁止轰炸鸭绿江桥的这个命令可算是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加于战地指挥官的一个最为无法辩护的和不明智的决定”^③。他争辩说,苏联拥有的报复力量远远不如美国,为什么让她束缚自己的手脚呢?美国拥有原子优势,为什么不利用这一优势呢?力量较强的一方,居然害怕攻击力量较弱的一方,实属荒谬。1950年12月30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封锁中国海岸,废除“台湾中立化”政策,最大限度地朝鲜利用国民党军队,支持蒋介石军队侵犯华南,将侵朝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④。他还建议应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地带。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所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要冒险发动一场甚至包括使用原子武器在内的世界大战。他发觉麦克阿瑟将军的看法同自己的看法距离那么远时惴惴不安地写道,“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象麦克阿瑟那样一位沙场老战士会不理解‘把中国国民党军队引导到中国南部去’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我也不相信,象他那样三十五年来在世界大事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人,会不认识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城市被轰炸的反应,会跟美国人民在珍珠港被轰炸时的反应一模一样;我也不相信他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他轰炸了中国的城市以后,苏联的物资仍将源源而来,如果他要贯彻到底的话,他第二着就得轰炸海参威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道!但是,正因为我相信麦克阿瑟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些事情,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险发动一次大战。我可不敢主张这样干。”^⑤1951年1月13日,杜鲁门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长信,断然拒绝批准麦克阿瑟所提出的扩大战争的方案,强调当时美国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团结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凡是涉及扩大战区的问题,行动得十分谨慎,并应经常考虑来自苏联的威胁。

六、和平解决还是战争解决

朝鲜问题究竟是寻求和平解决,还是依靠战争解决,这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争吵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到1951年春夏,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作较大的推进,战争处于僵持状态。美军如果继续北征,将会延长补给运输线并加宽战线,付出更大的代价。加之美国海外驻军遍布全球,战线太长,兵力分散。1950年12月9日,麦克阿瑟要求派兵增援日本(驻日美军已调往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一连串会议,想不出办法来应付这一问题,认为美国“国内简直就没有现成的增援部队”。至于南朝鲜伪军更是腐败无能,不堪一击。自战争以来,不到十个月时间,已经损失超过十个师所必须的武器装备。朝鲜战争名义上有个联合国军司令部,实际上美国承担着战争费用的最大份额,提供了全部侵朝陆军的50.33%,海军的85.89%、空军的93.38%^⑥。杜鲁门亲自呼吁拉美各国为侵朝战争“分担重担”,只有哥伦比亚作了响应,派出了象征性的地面部队到朝鲜,其他拉美国家都认为侵朝战争与自身利害无任何关系,不愿为美国火中取栗,提供炮灰。世界舆论强烈要求停止朝鲜战争。1951年1月17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的四项建议。接着,1月24日,印度、阿富汗等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尽快举行中、苏、美、英、法、印度和埃及七国会议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的提案,表示了亚非人民真诚的和平愿望。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正在兴起。美国人民自发地建立起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组织。他们举行集会示威,强烈要求和平解决朝鲜冲突,迅速结束美国历史上这一场极不得人心的侵朝战争。国际国内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很高,对美国统治集团压力很大。

1951年3月,杜鲁门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鲜冲突。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说国务院正在草拟一项准备由总统发表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声明,要他提出建议。麦克阿瑟则竭力破坏杜鲁门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努力。3月21日,麦克阿瑟在他的回电中建议,对他的指挥权不能再有更多的限制。3月24日,麦克阿瑟抢先发表一个旨在阻止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的公开声明,大肆吹嘘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强调制海权和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再次鼓吹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②4}。这一声明传到华盛顿时,杜鲁门气得嘴唇发白。他认为,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与总统准备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使政府经过详尽讨论的和谈计划“全部付诸流水”。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的、未经五角大楼事先批准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命令,是对宪法赋予总统权力的挑战,是对杜鲁门总统本人的侮辱。杜鲁门气愤地写道:“麦克阿瑟已使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了”。“除了解除这位国家高级战地司令官的职权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②5}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杜鲁门在等待和谈时机到来之际,麦克阿瑟又和国会反对派联合策划了一个新的反对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行动,投下了另一枚政治炸弹。1951年4月5日,杜鲁门的政敌、众议院少数党共和党领袖、众议员小约瑟夫·W·马丁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攻击杜鲁门不在朝鲜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政策“是不符合逻辑和违背传统的”,再次要求在远东进行一场打败共产主义的全面战争,甚至断言:“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②6}。杜鲁门严峻地说,麦克阿瑟心目中的胜利是把冲突扩大到整个中国而取得的胜利,这必然是错误的胜利。麦克阿瑟这封信已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美国宪法中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文职控制军人。政策是由民选的政治官员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军事将领来决定的。然而,麦克阿瑟却一再表示他不愿接受政府的政策。“如果我容忍他用这种方式来反对文职当局,我自己就会违背我要坚持和保卫宪法的誓言”,“我可不能让他主动辞职,我要把他开除”^{②7}。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指示新闻秘书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中中将接替他的职务”^{②8}。同日晚上,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着重阐述了为什么不能允许把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的理由,宣称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②9}。

杜鲁门罢免麦克阿瑟的决定是一个大胆而果断的决定,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侵朝战争遭到失败后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表面化和尖锐化,标志着杜鲁门、艾奇逊政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第一”的外交路线的暂时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共和党内“重亚轻欧”的新孤立主义者和院外援华集团,使主张在远东推行一种鲁莽而更富侵略性政策的麦克阿瑟遭到可悲的下场,使中美两国在本世纪50年代初避免了一场全面战争,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扫清了一大障碍。同时,维护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文职政府控制军人的原则,捍卫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注释:

①⑧⑨⑬⑮⑰⑲⑳ 《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305—306、253、300、281、277、285、296—297页。

② 阿瑟·林肯、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

③④⑩⑫⑭⑯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75、476、544、406、417、455—457、496、527—529、530页。

⑤ 美国《国会记录》,1951年1月8日。

⑥ 沃尔特·米尔斯编:《福雷斯特日记》,纽约维京出版社1951年版,第18页。

⑦ 美国《国会记录》,1949年,第1950页。

⑪⑬⑭⑮ 《美国总统公文汇编:哈里·杜鲁门,1950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65年版,第492、492、674页。

⑫ 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⑬ 《美国第82届国会1951年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关于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56年,第3383—3384页。

⑭ 弗朗西斯·H·赫勒:《二十五年后看朝鲜战争》,堪萨斯1977年版,第25页。

⑮ 弗雷·阿·沃尔斯特:《秘密使命》,纽约道布尔戴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5页。

⑯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9卷,第265—267页。

⑰ 《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 37/3,第294—296页。

⑱㉑ 巴顿·伯恩斯坦:《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纽约1966年版,第443—445、455页。

⑲ 约翰逊执行杜鲁门的命令犹豫不决。他说,麦克阿瑟给海外作战军人协会的信,只不过是个人意见。

㉑ 玛格丽特·杜鲁门:《哈里·杜鲁门》,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19页。

㉒ 转引自罗伯特·莱基:《冲突:朝鲜战争史》,第231页。

㉓ 约翰·斯帕尼儿:《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161页。

㉔ F·威廉斯:《艾德礼首相战时和战后回忆录》,伦敦1961年版,第237页。

㉕ 古德里奇:《朝鲜关于美国在联合国政策的研究》,纽约1956年版,第117页。

㉖㉗ 《美国总统公文汇编:哈里·杜鲁门,1951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65年,第222、223页。